

英雄、動員與控制：中國災難新聞中的情緒論述

Heroism, Mobilisation and Political Control : The Emotional Discourses of Disaster News in China

金麟* (世新大學新聞學系碩士班碩士生
E-mail : jlinningbo@gmail.com)

摘要

本論文結合新聞敘事學和情感敘事學兩種研究方法，以中國主流媒體《人民日報》為例，針對 2013 年 4 月 20 日中國四川蘆山地震的災難新聞，探討中國媒體如何情緒性地敘說新聞故事，以及其背後的意識型態。藉由檢視這種故事中的「英雄」形象的形塑過程，本文關注其被用作情緒動員以達到政治控制這一現象。此外，本文也將這一敘事結構置於中國的社會脈絡之中，分析其意涵。

關鍵字：新聞敘事、情感敘事、人民日報、蘆山地震、英雄、政治控制

*本文初稿曾在「2014 海峽兩岸數位匯流下的新聞與傳播學術探討會」(10 月 3-4 日，台北：世新大學)上宣讀。匿名評審亦對本文提出諸多寶貴建議，特此感謝。



Abstract: This paper is inspired by the news about the earthquake taken place in Sichuan province, Lushan county, the south-western part of China on April 20th, 2013. Taking a representative Chinese official media named People's Daily as an example, the paper explores how Chinese media narrate stories emotionally and analyses the embedded ideology in the news. It aims at observing the process of shaping heroic image and discussing political control through emotional mobilisation. In addition, it analyses the social significance of this narrative structure.

Keywords: narrative journalism; affective narratology; People's Daily; Lushan earthquake; hero; political control



一、前言

在現代社會中，我們生活在一個媒體無處不在的環境中。大眾媒介不僅向公民傳遞日常資訊，同時也建構社會，形塑公民身份，發揮著文化、社會、政治等多項功能。在重大災難發生時，媒體成為公眾獲取資訊的主要途徑，其作用尤為顯著。但長期以來，相關研究主要將媒體視為災難事件中的環境監視者角色。正如臧國仁與鍾蔚文（2000）所總結的，受到傳統大眾傳播研究中「議題設定」與「使用與滿足」理論的影響，過去的研究者常以大眾媒介的預警（warning role）或環境偵測角色探討其在災難中的正面功能。對此他們認為，媒體還具有「淨化全國民眾心情（catharsis）」的作用，更是災難後期有關複建、拯救、恢復社會正常運作的主要「資訊論壇」（disaster forum）。Pantti et al.（2012）認為，情緒已經植根於災難新聞的論述中，形塑我們對特定災難的理解與反應。

對災難新聞中情緒（emotion）的探討，是本文的出發點。¹傳統新聞學將情緒視為對客觀中立的倫理準則的背離。但是在傳播科技、後現代主義的影響下，研究者對新聞報導中情緒的看法正在發生改變。Abu-Lughod 與 Lutz（2009）定義情緒性論述是一種在世界中創造影響的社會行動形式。閱聽人以文化的方式解讀這種影響，兩者互動而形成情緒談話（emotion talk）。Lang et al.（1995）認為情緒化的訊息比平靜化的訊息能傳遞更多資訊，情緒能夠增強閱聽人的記憶與理解。

由上觀之，對災難新聞中的情緒論述實有研究之必要，有助於我們釐清數位時代媒體在災難中的作用。本文以中國四川蘆山地震為研究對象。蘆山地震發生在 2013 年 4 月 20

¹臧國仁與鍾蔚文（2000）指出，災難可分為自然災難與人為災難。其中，自然災難包括地震、水災、暴風雨、雪崩、旱災、土石流等，人為災難包括墜機、爆炸、陷落、核能輻射外洩等。本文所討論之災難／災難新聞，均指涉自然災難，並不涉及人為災難。



日，震級為 7 級，是中國近期較大規模的地震。截至 4 月 24 日 14 點 30 分，四川蘆山 7.0 級強烈地震共計造成 196 人死亡，失蹤 21 人，11470 人受傷。

不同於西方媒體自詡的「第四權」角色，中國媒體的性質是黨的喉舌，報導災難新聞時，必須遵循黨性原則與正面報導的方針。這一主導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中國媒體的實踐。以中國共產黨機關報《人民日報》為例，有關地震的報導經常出現「大愛」、「力量」、「砥礪」等標題，內容中也充斥情緒性論述。另一方面，在中國災難新聞中「英雄」形象亦時常出現，不論在搶通道路現場，抑或是救援時。英雄論述的出現意在強調災後救援平穩有序，更希冀以此凝聚人心。這些論述都與中共宣傳方針有直接關係，也有更深層次的政治文化內涵。

本文嘗試從新聞敘事學與情感敘事學（*affective narratology*）出發，以平面媒體為立足點，探討中國媒體功能以及其新聞實踐深層次的意涵，即如何藉由情緒性敘事進行情緒動員，以達到穩定人心、政治控制的目的。

二、文獻探討

（一）社會主義國家新聞報導

1. 黨性原則

當代社會主義國家諸如中國、古巴、北韓等國的新聞制度主要承襲蘇聯體制。Siebert et al. (1956) 認為，依循馬克思列寧主義、史達林主義，並混合了黑格爾和 19 世紀俄國的思想，在社會主義國家，報紙的首要目的是為社會主義系統服務，並接受黨的領導。

McQuail (1987) 進一步闡明蘇聯媒體理論的要義，認為蘇聯媒體理論可歸納為以下五點：



(1)工人階級（普羅大眾）從定義上在社會主義社會中握有權力，並必須要控制精神生產的手段。因此，所有媒體必須要接受工人階級的代理人，即共產黨的控制。

(2)社會主義社會是，或者立志於成爲，一個沒有階級的社會。因此在這個社會中不存在鬥爭。傳媒應與政治鬥爭無關。

(3)傳媒應該在社會形成和共產主義運動中發揮積極作用。這意味著爲了既定的社會和經濟目標，傳媒應該發揮社會化、非正式的社會控制和動員的作用。

(4)馬克思主義強調歷史的客觀規律，因此傳媒應該要反映客觀真實。

(5)在社會主義國家中，媒體由國家控制並與其他政治工具相統一。

中國媒體制度基本承襲蘇聯體制，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來，新聞機構一直由共產黨管轄，也就是黨辦媒體，黨管媒體。上世紀 90 年代以來，雖然中國媒體業逐漸從黨和政府的宣傳部門向國營資訊產業過渡，重視市場，帶動了採編運作制度的變化，與傳統蘇聯體制相背離(陳懷林 2000)。但是堅持共產黨領導的理念始終沒有改變，保持黨性原則始終是中國新聞工作的主要方向。早在 1942 年，毛澤東就提到要增強報刊宣傳的黨性。在給中共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的指示中，毛澤東提到「抓緊對通訊社及報紙的領導，務使通訊社及報紙的宣傳完全符合於黨的政策」(毛澤東 1942/1983: 97)。改革開放後，面對意識形態領域的衝擊，中共中央重申「黨的新聞事業的根本性質是黨、政府和人民的喉舌」。江澤民將喉舌論進一步提到了生命論。1996 年，他在視察人民日報社時指出：

黨的新聞事業與黨休戚與共，是黨的生命的一部分。可以說，輿論工作就是思想政治工作，是黨和國家的前途和命



運所係的工作（鄭保衛 2005：473）。

涉及到災難新聞報導，注重黨性原則，就是與黨和國家的抗震救災的方針政策保持高度一致。在報導災難新聞時，中國新聞媒體必須在黨的救災框架下報導，不能對黨的救災方針有所質疑，更不能反對其相關政策。

2. 正面報導

黨性原則還與正面報導和典型報導緊密相連。鄧小平曾對正面報導做出相關解釋：

要大力宣傳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正確性，宣傳黨的領導、黨和人民群眾團結一致的威力，宣傳社會主義中國的巨大成就和無限前途，宣傳為社會主義中國的前途而奮鬥是當代青年的最崇高的使命和榮譽。總之，要使我們黨的報刊成為全國安定團結的思想上的中心（鄧小平 1980/1994：255）。

一般認為，正面報導有這樣幾個特點。它的報導焦點往往集中在社會積極或光明一面；它的基調是提倡和鼓勵的；它宣導某種現象或觀念，以保持一定的社會道德水準和社會秩序；它強調「平衡」、「和睦」和「穩定」。鄭保衛（2005：435）認為，這種正面宣傳就是大力肯定、廣泛傳播中國共產黨的正確性，肯定共產黨領導的事業獲得了不容置疑的勝利，對人民而言，正面宣傳具有無窮的鼓舞力量，也是展示人民精神面貌的櫥窗。

3. 典型報導

典型報導是中國新聞事業與西方差異明顯之處，張威（2002）認為，典型報導是蘇聯，特別是中國新聞事業獨有的景觀，不具有普適性，換句話說，典型報導是社會主義新聞最重要的特徵。一般認為，中國新聞活動中的典型報導由毛澤東提倡，主要受到列寧思想的影響。



李良榮（1981）認為新聞報導中的「典型」一詞是從文學中引進，即同類事物或任務中具有代表性的個別事物或人物，強調個性和共性的統一，必須從一個側面體現當時的時代精神。中國共產黨在新聞工作中運用典型報導，最早可以追溯到 1942 年。當時 4 月 30 日，《解放日報》刊載穆青采寫的〈模範農村勞動英雄吳滿有〉，成為中國最早的典型人物報導。從這之後，典型報導成為報紙上經常性的內容，也成為黨報的一大特色和傳統，僅 1943 年上半年，《解放日報》上刊登的各條戰線上的先進人物就有 600 多名。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至今，中國主流報紙中均有典型人物報導，只是不同時期所塑造的典型形象有所不同。如 60 年代湧現的〈毛主席的好戰士——雷鋒〉、〈縣委書記的好榜樣——焦裕祿〉等人物典型報導以及大慶、大寨等先進集體典型報導，主要體現政治正確與經濟宣傳。80 年代張海迪、陳景潤、馬勝利等人物典型則主要體現尊重知識分子和敢想敢做的企業家（張威 2002）。

總的來說，黨性原則是中國新聞媒體進行包括災難新聞在內的新聞報導時所必須遵守的基本準則，而正面報導、典型報導則是宣傳報導的主要手段。這些原則和手段在新聞媒體的災難新聞報導實踐中運用得十分普遍。基於黨性原則，相關災難報導不能與黨的政策相左，必須與黨和政府的救災工作步調保持一致。藉由正面報導、典型報導，中國主流媒體牢牢把握住了災難發生時期輿論導向，並得以用情緒性的論述達到政治控制、社會穩定之目的。

（二）災難新聞中的情緒動員與政治控制

災難發生常帶有混亂場面，因而各國政府都十分重視社會局面的控制。但在現代資訊社會中，民眾獲取資訊的管道即是媒體，媒體實則扮演著政府與民眾之間中介角色。若用陶振超（2011）所言，媒介訊息常常扮演特定刺激物的角色，以左右人的情緒，媒體在災難時的作用十分重要。



Barton (1998) 研究 1852 年至 1956 年間《紐約時報》的情緒論述後發現，在 19 世紀 50 年代，記者毫不掩飾地對悲劇中的受害者表示同情，讀者在災難中處於被動地位，以記者所傳遞的視角情感性地認識災難。而到了 20 世紀，受到「現代聲音」(modern voice) 的影響，《紐約時報》在重大災難報導中才顯得比較克制。

英國的社會脈絡有所不同，但學者 (Pantti and Sumiala 2009; Pantti and Wahl-Jorgensen 2007; Wardle 2007) 分析 20 世紀 20 年代晚期至 20 世紀 90 年代晚期 *Daily mail* 和 *Times* 關於重大災難的報導後發現，情緒性的報導仍然存在，只是其出現呈週期性變化，不斷反覆。上世紀 90 年代末以來，對於災難的情緒性報導再次出現在媒體的實踐中。

這種情緒論述與媒體再現緊密相聯。媒體再現實際上是意義製造的過程。在此過程中，情緒論述充當了再現的手段，其力量是強大的。它不僅引導民眾對於災難的情緒反應，還暗示民眾在既定環境中應有的感受。一方面，在災難新聞實踐中，記者常以一種眼淚寫作的方法報導災難，以喚起公眾的同情之心。蔡琰與臧國仁 (2003) 認為，在台灣 921 地震等災難新聞中，記者並不是對事實資訊做簡單平鋪式的描述，但是添入了令人產生想像及情緒起伏的元素(如悲傷、憐憫、憤怒等)，從而顯現了新聞報導的社會影響力。林照真 (2010) 分析台灣電視媒體對莫拉克風災的報導後指出，電視報導強調戲劇化效果，這種情形在災難發生時尤其明顯。災難新聞的畫面以災難的眼淚、激動的哭喊為主，常以特寫的方式拍攝。又其報導的方式，常透過災民些微的生平背景，強調天人永隔的遺憾以引起觀眾的情緒。柯舜智 (2010) 在研究台灣電視媒體再現颱風災難新聞的內容後發現，為了刺激收視效果，恐懼、悲情、政治化與災民化的災難報導隨處可見。這也即是 Walter et al. (1995) 所談的「情緒監考」(emotional invigilation)。他們認為藉由災難新聞中有關死亡 (death) 和苦楚 (suffering) 的報導，媒體發揮了動員和管理情緒的功能，它鼓勵民眾產生特定的情緒反應。Jasper (1997:129) 進一步指出，災難新聞中的恐怖描述與痛苦畫面相結合能在



閱聽人中產生「道德打擊」(moral shock) 的感覺，從而使閱聽人走向行動。

二方面，災難有時候也成為公民抒發憤怒的場域，並為公民表達政治異見提供了論述資源。亞洲海嘯和卡特里娜颶風的新聞報導就是較為典型的例子。北歐國家對於亞洲海嘯的報導主要著眼於表達對政府救災不力的責難以及公眾的憤怒之情。而在卡特里娜颶風的新聞報導中，美國和世界的主流媒體都不斷譴責以布希為首的美國政府，同時颶風還凸顯了美國社會中的種族和貧困問題。在 2008 年中國汶川地震中，即使中國媒體廣泛讚揚救災行動，但國際社會依然對此有所責備。地震遇難者家長透過國外媒體，表達了對當地學校建築構造的不滿，質疑地方政府 (Pantti et al. 2012)。

若從更深層的角度來看，同情與憤怒的情緒論述展現了特定的情緒論述是如何產生不同的政治結果的。關於同情的論述促進了一種道德國家共同體的感覺，重構了集體認同並強化了文化價值觀。關於憤怒的論述則顯示了被媒介建構的災難也可成為政治批評的契機。從這一意義上來說，憤怒的情緒論述成為政治賦權的場域。但是憤怒的情緒論述引發政治風暴畢竟為數不多。總的來看，作為一種政治資本，災難成為政府加強政治控制，維護統治的工具，而這種控制是藉由意識型態的控制。具體到新聞實踐中，災難新聞中充斥了恐怖或是同情的論述，記者將焦點放在失去親人的家庭和社區中，並藉由情緒性的敘事方式傳達特定的社會意識型態。

反觀中國，由於中國社會脈絡獨特，因而新聞體制與資本主義國家有顯著差異。如前文所述，中國媒體報導災難新聞時多強調正面報導，不僅對於災難發生之深層原因不予追究，對於悲情式的報導也有所克制。孫發友 (2001) 認為，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中國的災難報導遵循著一條特殊的發展軌道。其觀念和形式，在這期間都發生了顯著變化。這種變化，以 20 世紀 80 年代為界分為前後兩個階段。前階段災難報導的主要特點是以人為本位，追求的是一種教化層面的意義，後階段轉向以事為本位，追求的是一種資訊層面



的價值。²但是邱敏（2008）研究 2008 年中國雪災報導後發現，雖然中國媒體對於災難報導的篇幅較大，但此次災害報導仍然遵循著傳統體制的總框架，即在災難報導中注重從正面塑造政府及官員的形象，以正面報導為主的總框架，並沒有發生根本的偏離。也正是因為正面報導的傳統，災難在中國媒體筆下往往並不是一個負面詞彙，有時甚至是正面積極的。每當重大災難發生時，中國主流媒體都會以多難興邦形容。³這意味著，在中國主流媒體的論述中，災難所帶來的悲傷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可以從救災過程中感受到中國政府的良好形象。是故，在中國社會脈絡之下，災難也成為政府加強政治控制的契機，只是與資本主義國家盛行的「烏鴉式報導」不同，中國媒體所走的是「喜鵲路線」（張愛傑 2009）。

（三）災難新聞與英雄原型

英雄形象源自神話。在神話中，反映人類以自己的文化創造與自然作鬥爭的是文化英雄神話。這類神話的主要特點是，故事的主人公是人而不是神。雖然這些人身上往往也有某些神性，或與神沾親帶故，但他們卻是人的力量的代表者。他們鬥爭的對象，或者是自然本身，或者是象徵自然力的神或怪。文化英雄神話是史前時代人類文化業績的一個投影，反映了人類對自然的征服（陳建憲 1994）。這類神話故事主要有後羿射日、精衛填海、女媧補天等。神話傳說中的一些英雄人物在自然災害面前似乎永遠可以克服遇到的一切困難，永遠都是人類的救世英雄（葉舒憲 1991）。但英雄不是僅在神話中才存在的事物。坎伯（Campbell）認為，神話中的英雄歷險乃是宇宙與文化生命永續不朽的主題，儘管描述它的文字、名相或角度必隨時代的演變而有更迭，各種文化和社會也因需求的差異而強調不同的英雄典型，但是英雄的

²董天策等（2008）則不贊成孫發友的界定，認為中國災難新聞報導方式應以 1980 和 2003 為界，分為三個階段，1949 年至 1980 年為黨本位的單向度閉合報導模式，1980 年至 2003 年為事本位的多向度客觀報導模式，2003 年至今為人本位的全息開放報導模式。

³多難興邦為中國成語，2008 年中國時任總理溫家寶在走訪汶川地震災區時再次提出，而後成為中國災難報導中頻繁出現的詞語。



質素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當代英雄的使命在於，凝聚出一套超越種族、國界、宗教、文化、社會等人為藩籬的象徵符號系統，從而使生命的深層意義為之彰顯（Campbell 1949／朱侃如譯 1997）。

而在現今的新聞報導中，依然可以看到英雄的蹤影。曾慶香（2005:229-235）認為由於東西方民族意識深處的「原型」不同，東西方災難新聞的敘事模式也出現了不同。西方諾亞方舟的故事主要表現的是上帝對人類的懲罰和拯救，故事中人類所承受的災難得到了淋漓盡致的描繪；而中國大禹治水的故事則不同，「帝」其實一直隱退在後，描述最多的是「帝」的臣子如何與災難頑強抗爭，對於人類所遭受的災難則是採用一筆帶過的方式。所以在中國神話故事裡，講述災難的發生通常只是為了引起「英雄」的誕生。

這種英雄原型也確實存在於中國災難新聞的報導中，孫發友（2001）研究中國災難新聞的報導模式後發現，20世紀80年代之前的報導模式是以人為本位，即在報導中，總是站在人如何與災難作鬥爭的角度來充分肯定人的精神和力量，甚至變成「災害不是新聞，抗災救災才是新聞」。雖然自改革開放以來，這一報導模式有所改變，但英雄式敘事的新聞依舊佔據中國主流媒體的大量版面。⁴

三、研究問題與方法

（一）研究問題

本文擬以中國主流媒體《人民日報》對蘆山地震的報導為例，嘗試回答下述研究問題：

⁴過往的典型報導塑造特定英雄人物，如雷鋒等人，現今雖並未有特定英雄人物，但中國災難報導所要發揮的作用沒有改變。誠如 Campbell (1949) 所說，當代英雄的使命在於，凝聚出一套超越種族、國界、宗教、文化、社會等人為藩籬的象徵符號系統。換言之，英雄在現今新聞報導中已成為一個價值符號，重要是文化和政治意涵。



1.中國主流媒體如何以情緒性敘事手法敘說災難中的英雄故事？

2.這種情緒論述隱含的意識型態為何？在中國社會脈絡下，意識型態與動員和控制之間存在何種關聯？

本文之所以選擇蘆山地震為分析主題，主要是基於以下幾個原因。首先，蘆山地震是中國近期發生的一次重大自然災難，影響廣，從重要程度來說具有研究之價值。其次，蘆山地震發生於 2013 年 4 月 20 日，中國最高領導人已由胡錦濤變成習近平，藉由分析蘆山地震的新聞報導，亦可發現習近平執政下中國主流媒體報導災難新聞的手法。最後，雖然蘆山地震的重大程度不及 2008 年中國汶川地震，但蘆山地震發生時之社會脈絡與汶川地震發生時已有明顯不同。汶川地震發生時，中國網路與新媒體尚處草創期，報紙與電視內容是一般民眾獲取資訊的主要管道。但是蘆山地震發生時，微博、微信等公共平台已非常成熟，且移動媒體亦深入到民眾的日常生活。在這樣的媒體生態下，中國主流媒體如何報導災難新聞的問題值得探討。

(二) 研究方法

本文嘗試從新聞敘事學和情感敘事學兩個角度分析情緒論述。新聞敘事的主要論點在於新聞（文字）報導不僅在真實事件的呈現，也是「故事的敘說」。自俄國形式主義以降，敘事學就有將敘事作品劃分內容與形式、素材與情節（*fabula and syuzhet*）、故事與情節（*story and plot*）、故事與論述（*story and discourse*）、內容與文體（*content and style*）等各種區分方法，此種對敘事結構二元對立的拆解方法有助於敘事創作或敘事文本分析（林東泰 2011）。但如同在文學創作中，內容與形式（或者說故事與論述）難以做明確區隔，常融合成爲一體。

本文使用的新聞敘事框架爲 Bell 所提出的新聞敘事結構。Bell（1991,1998）將新聞文本分爲屬性（新聞來源、地點和



時間)，摘要（標題、導言）以及故事。故事可由多個事件組成，涉及屬性、行動者、行動、場景（時間、地點）、後續發展（結果、回應）、評論和背景。



資料來源：The Language of News Media (p. 171), by Bell, 1991, Oxford, UK: Blackwell.

圖 1 Bell 的新聞敘事結構

新聞敘事是一個包含論述的複雜的概念。故事的敘說總是要通過各種不同的論述方式始能彰顯、傳遞故事，再現人們樂於知道的一系列社會事件（蔡琰、臧國仁 2012）。但本文認為新聞報導的類型眾多，災難新聞報導往往以情緒性論述再現災難造成的影響和救災行動，因而在分析過程中加入了情感敘事理論。

Hogan (2011) 在 *Affective Narratology: The Emotional Structure of Stories* 中檢視了小事件、大事件、章節、情節和體裁在情緒性過程中發揮的功能，強調情緒系統對於理解故事至關重要。他認為故事結構實際上是一種人類情緒系統的系統性產物。在描述普遍的敘事原型時，他指出雖然人類對於情緒的認知各有不同，但是「喜悅」是一種普遍性的情緒，因為「我們不會去追求我們認為不開心的東西」。據此，他提出了喜悅原型下的三種敘事原型：浪漫的 (romantic)、英雄式的 (heroic) 以及犧牲的 (sacrificial)。其中英雄式的敘事方式主要涉及兩條主線：阻止企圖篡權之人以及保衛國家。在這兩條主線中英雄要與企圖篡奪皇位的人以及破壞國家的人相鬥爭，這一鬥爭往往十分激烈，有時英雄還會因此而



死，如 Son-Jara 英雄史詩。犧牲式的敘事方式多從重大的自然災難展開，主要表現為某人的疏失造成無辜之人死亡，如中國傳統戲劇竇娥冤。Hogan 認為英雄式敘事表現出對國家的認同，而犧牲則彰顯特定的道德準則。但本文認為，犧牲式的敘述方式亦會有英雄式人物的出現，只是與 Hogan 所提之英雄式的敘事方式不同。Hogan 筆下的英雄式敘事方式強調英雄戰勝敵人，以及鬥爭、戰勝的過程，而犧牲式的敘述方式雖強調個人為拯救他人而死，但從道德標準來說同樣值得作英雄般稱頌。換言之，與其將英雄式敘事方式與犧牲式敘事方式分割對立，不如將兩者視為英雄敘事原型的兩個面向，前者強調保家衛國，後者強調捨己為人。若從中國災難新聞報導觀之，此兩個面向亦可用來分析情緒論述以及中國主流媒體敘說英雄故事之方式。

(三) 研究對象與分析步驟

本文文本選取對象為《人民日報》報紙版⁵。由於《人民日報》是中國共產黨的喉舌，屬於中國主流媒體，同時也是各國瞭解中國政治走向的風向標。因而從《人民日報》探討中國共產黨的報導宣傳策略是一種可行的方案，特別是在災難發生時，更易看到報導背後的意識型態。

表 1 廬山地震新聞分類統計

新聞類型	數量
純淨新聞	78
特稿/特寫	51
評論	16
其他	9
合計	154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⁵除報紙版外，《人民日報》亦有手機報、手機程式版和網路版，並在微博、微信等公共平台發佈新聞資訊。



本文以《人民日報》報紙版 2013 年 4 月 21 日至 4 月 30 日關乎蘆山地震的報導為文本蒐集範圍，因為 4 月 20 日為災難發生日，故起始日為 4 月 21 日，而自 4 月 28 日之後，災難救援逐步轉為災後重建，涉及蘆山地震的報導逐漸減少，故終止日選擇為 4 月 30 日。具體蒐集原則為檢視新聞報導是否與地震有關，若報導中既涉及地震又涉及其他主題，也將之視為災難新聞。最後共得到 154 篇報導，其中純淨新聞 78 篇，特稿／特寫 51 篇，評論 16 篇，其他 9 篇。⁶

因本文研究重點在於災難報導中的情緒論述，故以 51 篇特稿／特寫作為進一步篩選對象。具體分析步驟分兩步。其一，本文挪用 Hogan 所提之英雄、犧牲概念，並檢視 51 篇《人民日報》關於蘆山地震的特稿／特寫，藉此歸納出「戰勝自然災難的英雄」與「捨己為人的英雄」兩大分析面向，並以立意抽樣的方法選取了〈無愧於人民的信賴——黨中央、中央軍委指揮軍隊和武警部隊四川蘆山抗震救災紀實〉(2013.04.29, P1、2)、〈飛石下的生死抉擇——記武警交通一總隊宋永科、燕凱凱〉(2013.04.25, P10)、〈村支書高澤美 10 分鐘喊 238 戶全撤〉(2013.04.27, P6)和〈志願者全六軍：腰間安鋼板 免費拉客忙〉(2013.04.23, P7) 共四篇報導。⁷其二，依據前述敘事理論，擬採 Bell 所提出的新聞敘事結構分析新聞文本，亦即用屬性、行動者、行動、場景、後續發展、評論和背景七個面向做詳細分析，以探討中國災難新聞如何呈現英雄式的敘事結構。在分析過程中，本文結合語言學以語意為最小單位元分析新聞文本。

⁶這個統計是依據傳統新聞的分類方式。陳東園認為新聞特寫 (feature) (亦有人稱之為特稿)，不同於社論、短評的意見寫作與純淨新聞的事實寫作方式。它指的是，新聞報導內容由記者透過直接的觀察及個人經驗性的觀點，對新聞事象加以分析、解釋、評論，結構更深入地敘述新聞內幕。本次統計採此原則。表中其他為捐款、求證等難以歸納的內容。副刊、圖片等並不列入統計範疇。

⁷選取這四篇是基於代表性和典型性考量，既有長篇特稿，也有短篇特寫。另有《本報記者親歷——巨石就落在身後五米處》等其他特稿／特寫文章亦納入了具體分析中。



四、發現與分析

簡言之，本文關切災難新聞中中國主流媒體如何情緒性地敘說故事，以達到情感動員與政治控制之目的。經檢視相關文本後發現，災難新聞中充滿英雄故事。不同於傳統災難新聞傳遞資訊，講求客觀中立的報導，這些故事從記者的主觀角度出發，直接表現出強烈的政治目的。以下本文從「作為戰勝自然災難的英雄」和「作為捨己為人的英雄」兩個面向出發分析中國主流媒體災難新聞中的情緒論述，並以這種情緒論述所具之意識型態探討在中國社會脈絡下災難新聞背後情緒動員與政治控制的意涵。

（一）作為戰勝自然災難的英雄

英雄經常出現在中國主流媒體的新聞報導中，在災難新聞中尤為常見。在蘆山地震發生後，《人民日報》除報導地震資訊外，還推出了涉及英雄故事的人物紀實（類似特寫、特稿）。在這些人物紀實中，黨員、政府人員和軍隊是較常出現的主體。面對嚴重的自然災難，黨政軍英雄們以人民為己任，克服重重困難，深入地震災區與災害搏鬥，拯救人民的故事屢屢出現在《人民日報》的新聞報導中。

英雄的出現與災情緊密相連。地震發生的直接影響即是使災區與外界連結的通道中斷，造成救援工作困難。在〈連續 5 次爆破 清除兩塊巨石 蘆山縣城至寶盛鄉全線搶通〉（2013.04.23, P6）一文中記者這樣描述：

因地震引發山體滑坡，造成通往重災區寶盛鄉的救援通道中斷。搶通中，其他障礙都已經清除，唯獨兩塊房屋大小，分別重達 240 噸、180 噸的巨石，成了攔路虎。

240 噸、180 噸兩個精確的數字足以在閱聽人心目中造成強烈的衝突，為利於讀者理解，記者還形容兩塊巨石為兩座房屋。而在〈本報記者親歷——巨石就落在身後五米處〉（2013.04.22, P3）一文中困難也常與危難相伴。



想進災區，只有徒步。山間路況險峻，時常有餘震落石的危險……損毀的護欄旁停著被山石砸毀的汽車，折斷的樹木雜亂地鋪在路面上。路上餘震不斷，不時有山體滑坡發生……記者隨一支救援隊路過一處滑坡路段時，山上突然滾下巨石。眼看著茶几大的石頭就要往頭上砸，大家只能拼命往前跑，巨石落在身後 5 米處，整個山體騰起一片煙霧。

這段描寫可以分為兩個部分，包括場景描寫以及記者親身經歷。場景描寫部分，記者一再凸顯有落石危險，「護欄損毀」、「被山石砸毀的汽車」、「折斷的樹木」都是在暗示震區潛在的危險。之後記者用親身經歷告訴閱聽人危險的真實，「山上突然滾下巨石，巨石落在身後 5 米處」，如此場景令人怵目驚心。

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英雄出現了。在〈無愧於人民的信賴——黨中央、中央軍委指揮軍隊和武警部隊四川蘆山抗震救災紀實〉一文中，這種英雄式的情緒論述十分典型，以下從三個部分對此類敘事結構做詳細分析。

文章第一部分（見附錄 1-1）分陸軍和空軍兩種角色共同敘述面對災難時軍隊反應速度。「立即按響警報」、「迅速集合」、「以最快的速度源源不斷地」等對行為的描述，旨在強調軍隊在災難發生時反應之迅速。在評論方面，記者將軍隊與人民相連，用諸如「心連心、同呼吸、共命運」等極具情緒性的語言評價軍隊與人民之間的關係。為加強上述現場描寫之可信性，文章還引用普通民眾和外國媒體的評論。如民眾評價部隊「行動得這麼快」，《法蘭克福匯報》稱讚「解放軍多個軍兵種成爲了抗震救災的骨幹力量」。值得注意的是，文章引用《金融時報》的評論卻是「中國新領導層面對就職以來的第一場地震災難，迅速組織起強有力的反應」，說明黨領導軍隊的屬性。這些論述都意在指出軍隊在災難面對不但沒有缺席，而且是以最快的速度行動並展開救援。這也是災難報導中英雄故事敘述的第一步——英雄在現場。

第二部分（見附錄 1-2）講述的是武警官兵不怕困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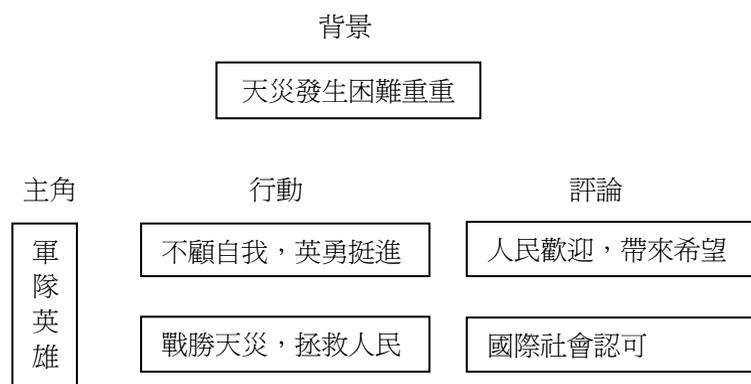


打通救災通道並營救受困群眾的故事。與前一部分相比，這一部分囊括的事件更加豐富，也更切實際，不僅包括與自然災難抗爭，打通救援生命線的成就，也還原了一個個生命奇跡出現的經過，在事件的行動上顯得更為具體。記者用「迅速展開」、「全然不顧」、「果斷下令」等詞形容武警官兵救災過程的井然有序，也顯示了武警官兵救災能力強，是人民的堅實後盾的思想。在縣武警中隊官兵營救民眾的故事中，記者描述官兵在餘震時仍全然不顧自身安危，爭分奪秒清理砂石瓦礫的場景。「全然不顧」、「爭分奪秒」意在營造軍隊救援時奮不顧身的形象。「閃耀的軍徽給受災群眾帶來了生命的希望」則凸顯軍隊的英雄本色，群眾似乎是一個等待被拯救的群體，而軍隊則充當了拯救者的角色。這個故事強調了軍隊深入災區並拯救群眾於水深火熱之中。在其他兩個故事中，記者用「創造一個又一個生命奇跡」，「不怕苦」，「不怕死」等詞句，亦是進一步加強了對英雄形象的形塑。這即是災難報導中英雄故事敘述的第二步——英雄在救援。

文章最後部分（見附錄 1-3）則是情緒性論述最強的一部分。當中主要講述了四個小故事（另有不具完整故事結構的單方面敘述），力求體現在災難中軍隊與人民之間的和諧關係，即軍愛民、民擁軍。文中記者用文學式的詞彙強調軍隊為人民帶去的溫暖，如為凸顯紅軍連的光輝形象，用「飽經滄桑的臉上露出了燦爛的笑容」加以形容；還有「更讓群眾暖心的是」、「含淚道別」等表達軍人在救援過程中的崇高品質。時間順序方面，本部分還用了倒敘手法，以加強文章的故事性。如在事件四中，記者先敘述了救災部隊將帳篷讓給群眾的故事，再用老人紀季氏的視角，將時間撥回 78 年前的此刻，敘述當時紅軍居住他家並幫忙劈柴、掃地的故事。這一部分較前兩部分來說，是本文的核心部分。前兩部分強調軍隊迅速反應和展開救援的故事，但此處為人民，更加側重災難下救災部隊與人民之間的關係。這暗示了軍隊不僅具備高效救援的能力，還擁有時時刻刻為人民，捨己為人的形象（這一特徵在下一節詳細分析）。這即是災難報導中英雄故事敘述的第三步——英雄拯救人民。



從上述內容，不難看出中國災難新聞的敘事結構，首先記者描繪了一個危險的震區，餘震不斷且與外界阻隔，若想要進入震區困難重重，充滿艱險。在這樣的背景下，記者開始敘說軍隊英雄不顧自我，英勇挺進，戰勝天災並拯救人民的英勇事蹟，在敘說的過程中也夾雜著記者個人的評論。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圖 2 中國災難新聞敘事結構之一

總的來說，《人民日報》的文章自標題始即強調黨和軍隊在救災過程中的重要性，不怕困難，勇於作戰。但與西方特稿講究對故事進行細緻入微的描述不同，《人民日報》的特稿並不在於對細節的描述，而是運用文學手法，將救援行為不斷反覆強調，並用一些主觀性的「評論」營造情緒氛圍，強化黨和軍隊在災難中的形象。而這實際上蘊含了意識型態。在敘事中，記者角色常在第一視角和第三視角間遊走，但基本上記者以零聚焦的方式講述故事，記者猶如上帝般俯視世界，清楚地知道事件發生的詳細經過，甚至是人物的表情（即使呈現第三視角時也如此）。這些情緒性論述均著力強調黨和軍隊的英雄地位。

（二）作為捨己為人的英雄

在災難新聞中，搶通道路，分發救災物資的英雄形象較常出現在《人民日報》的報導中，但本文認為不應忽視另一類英雄形象——作為捨己為人的英雄。此類形象主要依循情



感敘事學中「犧牲」原型理論。這一理論的主要邏輯是，在重大自然災難中，聖人爲救他人作出犧牲，常常表現爲死亡。在文學小說中，這種犧牲時常建立在罪惡之事中。本文將此理論置於災難新聞報導中，並結合英雄理論，得到「捨己爲人英雄」的敘事邏輯：在災難面前，黨政軍或普羅大眾不但沒有顧忌自己的安危，反而處處爲他人著想，有時甚至以生命爲代價。以下將這類英雄主體劃分爲軍人、黨政人士和一般民眾以分析此類敘事結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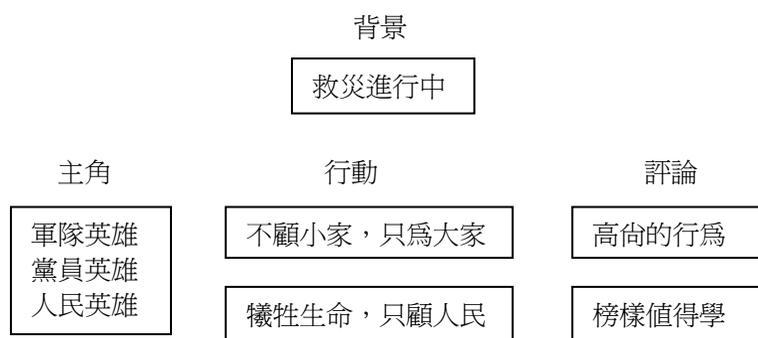
報導〈飛石下的生死抉擇——記武警交通一總隊宋永科、燕凱凱〉（見附錄 2）敘述的是宋永科、燕凱凱兩位武警官兵的個人故事。主要分三部分：一是宋永科、燕凱凱在生死關口拯救了群眾；二是兩人的基本資料，過去的故事；三是兩人現況，主要爲家庭方面。在敘述方式上，這篇報導主要採用倒敘手法。在文章開端，先交代事情結果——兩人爲保護群眾脫險住院但現已脫離生命危險，然後再講述事情經過，因而本文故事性較強。藉由故事描寫和背景介紹，此篇報導形塑了武警官兵捨己爲人、不怕犧牲的形象。在用詞方面，此報導亦十分講究，如在導言處描寫震區時連用「餘震突發」、「山體鬆動」、「飛石如雨」、「塵土瀰漫」四個短語；描述武警受傷情況時，使用「鮮血卻浸染著他們的軀體」，而不是重傷；使用「潸然淚下」，而不是一般的流淚。這些情緒性論述強化了武警官兵（軍人）犧牲自我的英雄形象。

〈黨政人士：村支書高澤美 10 分鐘喊 238 戶全撤〉（見附錄 3）這篇對村黨支書記高澤美的報導十分簡短，僅有 400 字。主要分爲救援故事和物資分發故事。記者敘事上用一種總分式的寫作方法，先肯定高澤美的救援成績，再講述其救災故事。但是這篇報導與其他英雄式報導有明顯不同：一方面，文章以白描的方式敘述故事，表面上情緒詞彙較少；二方面，這種情緒實則隱藏在字裡行間中，如記者這樣描寫地震發生時高澤美的行動，「緊急關頭，高澤美只是向家人交代了一句要呆在安全空地，便拔腿向外跑。」其中「只是」、「便拔腿向外跑」說明面對災難高澤美並沒有絲毫猶豫，且不顧個人家庭。此外，像「二話不說」、「毫不猶豫沖進屋中」、



「就在許多群眾仍驚慌未定之時，高澤美已把全村跑了個遍」等內容亦反映其在災難面前捨小家，為大家的精神。文章的第二部分將高澤美的行為與妻子的不理解做對比，從而進一步肯定黨員在救災過程中的積極作用。

對於普通民眾的特寫在《人民日報》的報導中雖不占很大比例，但也經常出現。與上述分析的個案不同，特寫〈志願者全六軍：腰間安鋼板 免費拉客忙〉是以記者第一人稱的視角，用內聚焦的方法敘述。在敘事方式上，記者僅是將全六軍所敘述的內容加以整理，寫成一則小故事。與上篇村支書報導相類似的是，表面上記者似不對事實加以判斷，但從用詞上仍可見捨己為人的英雄式的敘述。如文章一開始記者就突出全六軍受過腰傷，且從成都騎了八九小時的摩托車趕到蘆山縣；在文章末尾，記者寫道勸全六軍趕緊吃點東西，他卻笑笑說道：「別擔心，我肚子上別著鋼板呢，餓不著！」這些敘述暗示了記者的價值判斷：在災難面前，個人的利益應拋之身後，即使受傷挨餓也要為受災的群眾著想，為救援工作做貢獻。自然地，這篇報導也彰顯了人民的英雄地位，即在普遍民眾中就有英雄存在。这一部分的敘事結構如下：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圖3 中國災難新聞敘事結構之二

從中共宣傳政策來說，關於捨己救人英雄的新聞可列入典型報導之列，由於可發揮榜樣的力量，一直受到中國媒體的重視。與前一部分不同，這類典型報導雖然篇幅有長短差



別，評論亦不多，但都很重視細節描寫。此類細節描寫刻畫了救災過程中捨己爲人的英雄形象，而這種英雄形象又與社會主義意識型態密不可分。

五、討論：意識型態、情緒動員與政治控制

意識型態一詞，最早出現在法國啓蒙思想家特拉西（Antoine Destutt de Tracy）於 1801 年至 1815 年所著的《意識型態基礎》一書中，指出意識型態意味著由觀念或理念（ideo-）和學說（-ology）所組成，其用意在於建立一套觀念學（science of idea），即意指觀念的起源，演變和性質的研究（王瑞鎰 2004）。到了 19 世紀中期，馬克思與恩格斯（1845/1975）挪用 ideology 的貶義，認爲統治階級的思想在每一時代都是佔統治地位的思想。隨著結構主義、後現代主義思潮的蓬勃發展，一些學者在馬克思的基礎上對意識型態的概念提出了新的見解。

Althusser（1970）認爲，意識型態所代表的是個體與其真實存在狀態的關係，是一種物質性實存。換言之，意識型態始終存在於一個機構以及它的實踐之中，不僅在過去我們所認爲的暴力機構中，也在媒體、學校等機構中。意識型態具有召喚（hail）的功能。Gramsci 則強調媒體即是意識型態，統治優勢權力團體必然動員各種資源、運用各種方式，來塑造對其有利的合法性解釋，媒體再現的傾斜也很明顯。優勢階級的意見常被視爲常識，意識型態便能達成它的目的，不容易被察覺（Hall 1996）。

van Dijk（2000）發現，相較於其他擁有權力的精英團體，如政客、企業主或專業人士等，媒體精英在主導意識型態再生產上的影響力最大。媒體以自己的價值觀再現並建構現實，而這種價值觀實際上是統治階級所主導的思想信仰體系之反映。在災難新聞報導中，新聞敘事過程是災難現象的建構過程，這些被建構的故事不僅反映出災難的影響，也可以表現爲一種特定的詮釋災難的框架，或者說是一種特定的認識災難的方式。從上述個案中，不難看出媒體以情緒性論述敘



述故事，建構了災難中的英雄形象。這些英雄不僅克服重重困難，與地震搏鬥，還捨己為人，以人民群眾的生命安全為根本目標。這隱含著中國社會愛黨、愛國、愛社會主義，講究社會主義價值體系的主流意識型態。⁸

因而在災難事件中，《人民日報》積極宣傳黨員、軍人等英雄故事，集中反映了中國社會脈絡下的國家意識型態。首先，宣傳此類英雄故事，以加強對執政黨中國共產黨的認同。在中國體制下，中國共產黨領導政府、軍隊。因此，除直接宣傳中國共產黨外，媒體報導政府積極救災、軍隊英勇救援，則從側面肯定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隱含了愛黨的意識型態。其次，這種愛黨的意識型態又與愛國愛社會主義的思想緊密結合在一起，黨政軍人民在中國共產黨論述中為一體化。由於中國共產黨在社會主義建設中處於領導地位，那末愛黨，則與愛國愛社會主義的意識型態相連。最後，英雄故事中所具之道德意涵也被冠以社會主義價值觀，加強了對黨、國、國家體制的認同。例如在〈無愧於人民的信賴〉一文中，記者如此敘說軍隊：

肩負著黨中央、中央軍委和習近平主席的信任與厚望，救災部隊發揮生力軍和突擊隊作用，不怕疲勞、連續作戰，沖鋒在前、勇挑重擔，以實際行動書寫著對黨和人民的忠誠。救援隊所肩負的是黨中央、中央軍委和習近平主席個人的信任和厚望，書寫著也首先是對黨的忠誠。

這表明軍隊要對黨忠誠的意識型態，自然也暗示一般民眾。又如〈志願者全六軍：腰間安鋼板 免費拉客忙〉一文末尾處：

從到達蘆山，到 21 號中午，全六軍到處忙活，滴水未進，記者勸他趕緊吃點東西，他卻笑笑說道：「別擔心，我肚子上別著鋼板呢，餓不著！」

⁸中國共產黨強調黨的宗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因而在新聞中強調愛黨亦即強調愛人民。



記者用這一論述也暗示了在災難面前，個人應為集體著想，為國家犧牲個人利益的意識型態，這也即是中國共產黨一直提倡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之部分。

在敘事手法上，英雄形象之形塑與情感敘事聯繫密切。情感敘事講求發揮故事中情緒的作用，希以喜悅感染閱聽人來達到傳播目的。由於中國新聞實踐重視正面報導與典型報導，傳遞積極向上的正能量，這種敘事手法在中國的新聞報導，尤其是在災難新聞中，十分常見。一方面，情感敘事中所蘊含的情緒因素能夠化解閱聽人對災難的恐懼心態；二方面，不論是戰勝自然災難的英雄還是捨己為人的英雄，均表現了中國人民面對災難時不屈不饒的精神，這也是媒體對個體的召喚。

更進一步來說，這種情緒性敘事是為達到動員以及政治控制的目的。政府作為國家的一部分，從誕生之日起，就具有了雙重屬性(王時中 1999)。它從原始公共管理機關那裡承繼了社會公共管理職能，同公共權力有機地聯繫在一起，執行著社會「公共事務」；同時表現為一個專門的管理體系，一個實現經濟上占統治地位的階級的根本利益的機關。這就是政府的二重屬性，即作為公共管理機關的屬性和作為組織統治工具的屬性。由於中國的國家屬性，黨和政府不容分割，因此政府對災難報導的控制實際上也反映出黨對此的控制。亦即黨和政府雙重控制，但又兩者為一。這一控制即以意識型態為內涵，情緒動員為手段實現。

六、結論

本文從新聞敘事學和情感敘事學出發，加入英雄原型理論，探討中國災難新聞中媒體之情緒性敘事結構。本文認為，中國主流媒體《人民日報》在黨性、正面報導、典型報導等原則的規範下，在災難新聞中重視「戰勝災難的英雄」和「捨己為人的英雄」兩類英雄的形塑，傳達愛黨愛國愛社會主義的意識型態，並以情緒動員的方式達到政治控制之目的。



不同於過去對災難新聞的敘事結構分析，本文在研究中加入了文學中的情感敘事學和英雄原型理論，以跨學科的視角檢視相關文本。本文亦發現，新聞論述與故事事實相容之關係，災難新聞中情緒性論述反映故事之意識型態（事實上情緒性論述本身即有意識型態），意識型態又藉由情緒性論述進行情緒動員以達到意識型態控制之目的。兩者之間不斷互動，以達成最終目標。

此外，由於蘆山地震發生於習近平領導期間，這意味著，《人民日報》報導災難新聞的手法並沒有隨著領導人的改變而發生明顯變化，依然較為僵化，著重描述英雄人物／行為，過度強調政治宣傳的功能。而中國的新媒體環境也沒有對此種報導手法產生重大影響。

本文認為未來研究或可從以下幾點做深入研究。首先，本文的研究對象為《人民日報》報紙版，並沒有將其微博內容、手機版、網路版等內容納入其中，亦沒有將《人民日報》與其他中國平面媒體或電視媒體做對比，相關學者或可從此出發探討平面媒體與電視媒體、中央媒體與地方媒體等不同層級媒體與不同性質媒體報導災難新聞之敘事異同。其次，本文所做的是文本分析，認為文本中英雄有動員與政治控制之功能，但是這種情緒性論述究竟對閱聽人產生何種影響，則可做進一步闡釋。最後，從文獻探討與研究發現不難看出，資本主義社會媒體與社會主義社會媒體對災難新聞的報導存在不少差異，而中國媒體幾十年來報導災難新聞的手法也或有變化。若有可能，相關學者可檢視歷年來中國／中外災難新聞以探尋背後的邏輯與規律。

附錄

1、〈無愧於人民的信賴——黨中央、中央軍委指揮軍隊和武警部隊四川蘆山抗震救災紀實〉分析過程



1-1

	事件一	事件二	事件三	事件 N
屬性	做出救援反應			
背景	大地顫抖，樓宇傾頹。(即地震發生)			
場景	20 日上午 8 時 02 分蘆山縣	20 日上午 8 時 02 分雅安市	20 日上午 8 時 12 分成都市
行動者	武警四川省總隊蘆山縣中隊官兵	四川省軍區雅安軍分區、武警雅安市支隊所屬官兵	成都軍區	
行動	一班長郭季平立刻按響警報。隨著中隊長陳發湖下達緊急命令，中隊 22 名官兵迅速集合起來，兵分兩路趕赴縣城參與救援。	就地展開救援。	召開抗震救災作戰部署會。	
後續發展	一場大規模的地震救援行動，迅即展開。			
評論	<p>(1) 一支支勁旅和軍隊專業救援、醫療隊伍從成都、邛崃、阿壩，從北京、雲南、重慶出發，向著同一個方向緊急開進，一場與時間賽跑、同死神抗爭的大救援瞬間拉開帷幕。</p> <p>(2) 當人民需要的時候，與人民心連心、同呼吸、共命運，子弟兵第一時間出現在震後的廢墟上，出現在受災群眾最需要的地方。</p> <p>(3) 真沒想到，部隊行動得這麼快。(民眾駱大斌)</p> <p>(4) 中國新領導層面對就職以來的第一場地震災難，迅速組織起強有力的反應。(金融時報)</p> <p>(5) 解放軍多個軍兵種在第一時間向震區派遣救援力量，作為最具戰鬥力的國家強力機器，成為了抗震救災的骨幹力量。(法蘭克福匯報)</p>			



1-2

	事件一	事件二	事件三
屬性	進行救援		
背景	與時間賽跑，和死神抗爭，全力搶救受困群眾，全力救治危重傷員……（即地震造成了極大的破壞）		
場景	20日上午		
行動者	縣武警中隊官兵；趙建忠一家、高詩琴	醫護人員與解放軍總醫院專家	武警交通一總隊
行動	縣武警中隊 20 名官兵營救趙建忠的妻子和孩子。餘震襲來時，官兵們仍全然不顧，爭分奪秒清理砂石瓦礫。	醫護人員與解放軍總醫院兩位專家遠程會診。	武警交通一總隊 100 余名官兵連夜投入戰鬥，清除場方巨石。
後續發展	20 分鐘多分鐘後，母女被成功救出。	成功救助高詩琴。	打通生命道路。
評論	一座座村落裡，一處處廢墟上，閃耀的軍徽給受災群眾帶來了生命的希望。黃金 72 小時內，抗震救災官兵救治傷員 2800 多人，協助安置轉移群眾 2.4 萬餘人……	20 支醫療隊進村入戶，全軍頂級專家匯聚災區。精湛的醫術、高尚的醫德、科學的施救，創造了一個又一個生命的奇跡。	在最危險的地方，在最緊急的時刻，在最關鍵的環節，人民子弟兵發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英勇頑強、晝夜奮戰，保持旺盛鬥志和持續戰鬥力，把希望和溫暖送到災區群眾心中。

1-3

	事件一	事件二	事件三	事件四
屬性	進行救援（強調與人民之間的聯繫）			
背景	缺糧、缺水、缺帳篷，重災區寶興縣一度交通中斷，救災物資告急。			
場景	24 日救災路途	震後不到 1 小時山上	23 日下午仁義鄉紅軍村	21 日下午龍門鄉紅星村



行動者	成都軍區聯勤某分部	四川省軍區軍人；八旬老太	紅軍連	救災部隊
行動	派出20輛大型運輸車組成車隊，將100餘噸急需物資送到受災群眾手中。	軍人冒著餘震將老太背下山	趕赴紅軍村執行搜救傷員和安置群眾任務。	將130頂帳篷讓給龍門鄉紅星村群眾
後續發展		八旬老太來救災指揮部找恩人	3個小時後，連片的帳篷中升起了縷縷炊煙	
評論	一滴水可以映照出太陽的光輝，一車車物資展示的是 <u>人民軍隊愛人民的魚水深情</u> 。	震後的殘垣斷壁，處處湧動著 <u>軍愛民、民擁軍</u> 的魚水深情。	生活的希望在災後的紅軍村重新點燃； <u>災難面前，子弟兵永遠是人民群眾值得信賴的力量</u> 。	<u>人民的笑容，永遠是子弟兵最美的夢想。人民軍隊與災區群眾生死與共，心手相牽。經歷了強震浩劫的大地，正逐漸恢復生機。</u>

2、〈飛石下的生死抉擇——記武警交通一總隊宋永科、燕凱凱〉分析過程

屬性	搶通道路與救援
背景	餘震突發，山體鬆動，造成塌方。
場景	21日上午11時59分，蘆山縣玉溪飲水大壩至寶盛鄉之間
行動者	宋永科、燕凱凱等官兵，群眾
行動	<u>眼看就要被飛石擊中，宋永科和燕凱凱不顧自己的生命，將群眾往安全區推。</u>
後續發展	濺落的飛石先後將宋永科和燕凱凱擊落到20多米高的路基護坡下， <u>鮮血卻浸染著他們的軀體。</u>
評論	<u>將群眾往安全區死命推，把生的希望留給群眾。</u>



3、〈村支書高澤美 10 分鐘喊 238 戶全撤〉分析過程

屬性	救援	物資分發
背景	地震	一組組長將救災帳篷分給高澤美家
場景	20 日上午 8 時 12 分（地震後 10 分鐘）落改村	23 日凌晨高澤美家中
行動者	村黨支書記高澤美	村黨支書記高澤美、高澤美妻子
行動	<p>(1) <u>只是向家人交代了一句要呆在安全空地，便拔腿向外跑。</u></p> <p>(2) 路遇黨員高永清，將村一二組的疏散任務交代給他，並呼喊村民轉移到安全地帶。</p> <p>(3) 將患有眼疾、行動不便的八旬老人曹漢祥背出。</p>	<p>高澤美看到牆角裡放著上面送來的民政救災帳篷，「一肚子火就上來了，上面撥來的帳篷還不多，我家怎麼能先拿！」</p>
後續發展	<u>跑遍全村確保大家安全</u>	起初，妻子對高澤美也發了火。後來，經高澤美開導，妻子慢慢想開了……
評論	無	

4、〈志願者全六軍：腰間安鋼板 免費拉客忙〉分析過程

屬性	協助救援
背景	地震發生
場景	20 日-21 日中午；成都；蘆山
行動者	<u>受過腰傷的全六軍</u>
行動	<p>(1) 帶食物從成都騎車八九小時到蘆山縣</p> <p>(2) 在蘆山縣，他在三輪車窗貼上寫著「免費志願者」的紙張，用三輪摩托車到處拉人、拉物資。</p>



參考文獻

- 中國地震局 (2013.04.24)。四川省蘆山「4•20」7.0 級強烈地震已造成 196 人死亡。2014 年 1 月 20 日，取自 <http://www.cea.gov.cn/publish/dizhenj/464/515/20130424151126102109913/index.html>。
- 毛澤東 (1942/1983)。增強報刊宣傳的黨性，載於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新華通訊社(合編)，**毛澤東新聞工作文選**(頁 96-97)。北京：新華出版社。
- 王時中 (1999)。現代政府管理通論。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 王瑞鎰 (2004)。後鄧時期中共政治意識型態的轉變：以三個代表為例。政治大學碩士論文。
- 朱侃如 (譯) (1997)。J. Campbell 著。千面英雄 (The hero with a thousand faces)。新北：立緒。
- 李良榮 (1981)。關於典型和典型報導。2014 年 1 月 20 日，取自 <http://media.people.com.cn/GB/22100/67945/67946/4587836.html>
- 林東泰 (2011)。電視新聞敘事結構初探，**新聞學研究**，108。
- 林照真 (2010)。是報導災難新聞還是製造新聞災難？：從莫拉克風災的電視新聞產製正視災難傳播與災難管理關聯性。論文發表於 2010 年中華傳播學會年會，嘉義縣。
- 邱敏 (2008)。對外傳播中災難性事件報導的分析和思考——以《中國日報》2008 年雪災報導為例，**東南傳播**，47。
- 柯舜智 (2010)。災難傳播的真相與擬像。論文發表於 2010 年中華傳播學會年會，嘉義縣。
- 倪炎元 (2013)。從語言中搜尋意識形態：van Dijk 的分析策略及其在傳播研究上的定位，**新聞學研究**，114。
- 孫發友 (2001)。從「人本位」到「事本位」——我國災害報導觀



念變化分析，**現代傳播**，2001（2）。

馬克思、恩格斯（1845/1975）。費爾巴哈-唯物主義觀點和唯心主義觀點的對立，載於中央編譯局（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頁 52-53）。北京：人民出版社。

張威（2002）。典型報導：淵源與命運，**新聞與傳播研究**，2002（2）。

張愛傑（2009）。並行不悖的中國正面報導和西方負面報導，**青年記者**，2009年2月下。

陳建憲（1994）。**中國古代神話的母題——神祇與英雄**。北京：三聯。

陳懷林（2000）。試析中國媒體制度的漸進改革——以報業為案例，**新聞學研究**，62。

陶振超（2011）。**情緒在媒介訊息處理中扮演的角色：認知取徑媒體研究之觀點**，論文發表於2011年中華傳播學會年會，新竹市。

曾慶香（2005）。**新聞敘事學**。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

葉舒憲（1991）。**英雄與太陽：中國上古史詩原型重構**。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董天策、蔡慧、于小雪（2010）。當代中國災難新聞報導模式的演變，**新聞記者**，2010（6）。

臧國仁、鍾蔚文（2000）。災難事件與媒體報導：相關研究簡述，**新聞學研究**，62。

蔡琰、臧國仁（2003）。由災難報導檢討新聞美學的「威性認識」：兼談新聞研究向美學轉向的幾個想法，**新聞學研究**，74。

蔡琰、臧國仁（2012）。新聞圖文敘事之競合論述關係：以「水淹高雄岡山晉德老人安養院」個案報導為例，**新聞學研究**，111。



- 鄧小平 (1980/1994)。目前的形勢和任務，載於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 (編)，**鄧小平文選第二卷** (頁 239-273)。北京：人民出版社。
- 鄭保衛 (2005)。中國共產黨新聞思想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 Abu-Lughod, L., and Lutz, C. (2009) “Emotion, discourse, and the politics of everyday life.” In: J. Harding and E. D. Pribram (Eds.) *Emotions: A cultural studies reader* (pp.100-12). London, UK: Routledge.
- Althusser, L. (1971) “Ideology and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 In: L. Althusser (Ed.) *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 (pp. 127-86).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 Barton, M. (1998) “Journalistic gore: Disaster reporting and emotional discourse in the New York times, 1852-1956.” In: P.N. Stearns and J. Lewis (Eds.) *An emotional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pp. 155-72).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 Bell, A. (1991) *The language of news media*. Oxford, UK: Blackwell.
- Bell, A. (1998) “The discourse structure of news stories.” In: A. Bell and P. Garrette (Eds.) *Approaches to media discourse* (pp. 64-104). Oxford, UK: Blackwell.
- Hall, S.(1996) “Gramsci’s relevance for the study of race and ethnicity.” In: D. Morley and K.-H. Chen (Eds.) *Stuart Hall: Critical Dialogues in Cultural Studies* (pp.411-46).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Hogan, C.,P.(2011) *Affective Narratology: The Emotional Structure of Stories*. Lincoln, NE: The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 Jasper, J. (1997) *The art of moral protest: Culture, biography, and creativity in social movement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ang, A., Dhillon, K. and Dong, Q. (1995) “The effects of emotional arousal and valence on television viewers’ cognitive capacity and



memory.”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and Electronic Media*, 39(3), 313-327.

McQuail, D. (1987) *Mass Communication Theory: An Introduction*. London, UK: Sage

Pantti, M. and Sumiala, J.(2009) “Till death do us join: Media, mourning rituals and the sacred centre of the society.” *Media, Culture & Society*, 31(1), 119-135.

Pantti, M. and Wahl-Jorgensen, K. (2007) “On the political possibilities of therapy news: Media responsibility and the limits of objectivity in disaster coverage.” *Communication review*, 1, 3-25.

Pantti, M., Wahl-Jorgensen, K. and Cottle, S. (2012) *Disaster and the Media*. New York: Peter Lang Publishing Press.

Siebert, F., Peterson, T. and Schramm, W. (1956) *Four Theories of the Press*. Urbana, I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van Dijk, T. A. (2000) “New(s) racism: A discourse analytical approach.” In: S. Cottle (Ed.) *Ethnic minorities and the media* (pp. 33-49). Milton Keynes, UK: Open University Press.

Walter, T., Littlewood, J. and Pickering, M. (1995) “Death in the news: The public invigilation of private emotion.” *Sociology*, 29(4), 579-596.

Wardle, C. (2007). “Monsters and angels: Visual press coverage of child murders in the US and UK, 1930-1990.” *Journalism*, 8(4), 281-302.

